



两国有银行过年：禁讨红包 拜年禁说恭喜发财

在新年开工第一天，“扫楼”讨红包几乎是写字楼里未婚年轻人的“例牌节目”。今年部分国有银行广州分行却要求员工“低调过年”，不得“扫楼”讨红包。更有银行员工称甚至连“恭喜发财”也成为“敏感词”。

两大国有银行禁讨红包

去年大年初七，国有A银行广州东山支行的Cherry和同事们结伴在办公室“扫楼”大半天，从上司、已婚同事手中斩获红包上千元。下班回家，她还意犹未尽地在微博晒战绩：“109封，而已……”

一年后的2月16日，Cherry只能通过微博上遥看其他公司的“扫楼”盛况。因为在蛇年开工的第一个上午，她只在部门内部讨了几封红包，就回到办公桌前开始工作。

同在A银行工作的阿Pat相当郁闷，“过年前，上头有令，要过一个平淡而有意义的新年，禁止串部门讨红包，提高工作效率。”

这家国有银行并非特例，同属四大国有银行的B银行的广州分行今年也有类似规定。该银行东风西支行的Kason说：“在春节前的一次例行早会上，上司传达高层通知，要求今年不得‘扫楼’讨红包。”

过往每年的开工第一天，银行高层都会到下属的支行和营业网点向员工拜年。“今年上司要求，不但不能向高层讨红包，而且拜年的时候不要讲‘恭喜发财’，只可以说‘新年好’。”Kason说。习惯讲“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的同事，只好适应新的拜年贺词。

其他银行未闻类似禁令

记者16日还采访了另外两家公司有银行，对方均表示没有类似规定。C银行某支行的小亭开工第一天就讨到了二十多封红包，还没来得及拆。“这些都是上班前讨的，然后才开工，没有影响工作。”

“D银行去年开始倡导员工文明拜年，不过，我们也十分尊重传统过年习俗，讨红包也是图个喜庆，公司没有要求员工不能讨红包。当然，希望大家适度为宜，最好不要占用上班时间。”D银行的周经理问过几位下属职员后回复记者。

与国有银行相比，外资公司自由许多。外资E银行的邱小姐16日上班，未婚的她已摩拳擦掌准备在银行里到处讨红包。而在某外资保险公司在工作的已婚徐女士准备了50封红包，16日上班被“一扫而光”。

“第一天上班，何不开开开心让大家‘扫楼’，延续一下过年气氛？”Cherry说，自己讨来的红包，少则一元，多则二十元，只是为了讨个彩头而已。

未婚一族大叫“没意思”的同时，银行里的已婚人士则偷着乐。已婚的徐小姐得知有此新规定后说：“要发红包的人肯定赞同低调过年，可是讨红包的人当然是另一种说法了。”

(摘自《新华网》)



未婚年轻人在春节期间喜欢成群结队地扫楼讨红包。

“财政部门正在会同国资委等部门研究制定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同时优化支出结构。”接近财政部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近日对记者称。

对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的具体幅度，国务院日前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已经定调：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目前，资源类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为15%，一般竞争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10%，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5%，烟草类央企为20%。

据上述消息人士称，这四类央企上缴红利的调整不会类“一刀切”的都是5个百分点，资源类、垄断类和烟草类的央企调整会相对多一些。而他更倾向于一次性把5个点调整到位，而不是分批次调整。

上缴比例仍偏低

在今年的第1号公告中，国家审计署便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不完整”、“现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



中国广义货币高企何以不构成通胀

我国M2与GDP之比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是高储蓄率、高资产负债率、低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再加人民币依赖外汇占款的发行机制，居民收入的存款储蓄倾向和外汇占款流入补充企业现金流的综合反映。因而，这个比例过高，并不构成通胀或资产泡沫。

在最近公布的宏观数据中，广义货币M2与名义GDP的比值引起了广泛兴趣。2012年M2与GDP之比达到187%，创出新高，并仍保持不断上升之势，M2绝对量达97.42万亿，较2008年翻了一倍。这个比值远超欧美国家，更遥遥领先于起点差不多的其他“金砖”国家：美国的比值为60%，欧元区44%，日本约144%。

我国M2与GDP之比持续高企由来已久。有人认为，这表明货币供应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货币超发严重，形成了“货币堰塞湖”。而按货币学派有关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经典定义，经济中流动性过多的最终会导致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只是这样的局面始终不会出现。

早在1993年，当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就将1978年至1992年中国广义货币高速增长，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价格水平保持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超额货币之谜”。当时国内学者倾向于用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货币化来解释，称之为中国货币深化程度提高。近年来，由于社会普遍对通胀和通胀预期越来越敏感，M2与GDP比值太高是否意味着经济中积存了太多的货币和流动性，中国是否将长期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央行是否该采取措施致力解决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也就成了争论不休的问题。

笔者梳理众多解释“货币之谜”或“货币堰塞湖”的研究，除货币化进程的一种解释

央企上缴红利比例酝酿上调 专家称现有比例太低

比例仍偏低”等涉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若干问题。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亦佐证了审计署的观点：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875.07亿元；预计收取企业税后利润823亿元，比前年执行数增加65.64亿元；而2011年已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14943.9亿元，实现净利润11115亿元。简单测算，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央企利润上缴比例不足10%。

“目前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上的问题比较多，不足为奇，因为央企上缴红利的光景不过5年。”财政部财科所一位专家对记者说。

据他介绍，2007年之前，央企只纳税，利润不用上缴；从2007年开始，央企才告别不缴红利的历史。

按照2007年颁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上缴红利的央企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资源型企业，收取比例为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企业，收取比例为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规定暂不上缴。

此次入选第一类的企业包括中国国电、中石油、中石化、神华集团、国家电网、中移动、中国烟草总公司等；入选第二类的包括中国铝业、中国南车、宝钢、中国国航、招商局集团等；中国核工业集团入选第三类。

2011年又做调整，央企按收取比例具体分为四类：前三类分别上缴税后利润的15%、10%、5%，第四类为免缴国有资本收益的两家政策性公司，它们是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和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

同时，教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属企业，农业部直属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

68%富裕人群每人次境外游费用超5万

2月19日，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携程旗下顶级旅游品牌鸿鹄逸游发布《中国高端旅游客户行为研究报告》，这是国内高端旅游品牌首次发布的用户偏好报告。其中显示，68%富裕人群每人次境外旅行费用超5万，中国仍是富裕人群首选目的地。

中国旅游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通过调研发现，目前53%的富裕人群每年境外旅行次数达3次以上，每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虽然还在第一类企业之列，但其2012年上缴的红利已经提高到了20%。

5年时间，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从无到有，而且还有5到10个百分点的上升。不过，一些业界人士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国企红利征收依然存在范围小、力度小的问题。

国资专家、北京求是联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安林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一些资源性、垄断性的公司，应该大幅度提高收取比例，20%太低了。

“对这些企业来说，如果不上缴红利，其利润就会有被企业内部集团占有的危险，这也不符合国家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安林称。

而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观点则更为“激进”：一般央企的收取比例应该达到50%才行，像中国烟草总公司这类公司，甚至应该达到100%，否则国家办国有企业有何意义！

一次性调到位？

事实上，关于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讨论，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改革难度很大，主要原因是牵扯到太多的利益分配。

去年3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今年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从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健全税收制度改革三方面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

其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作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被给予了特别强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首次将地方国有资本纳入经营预算。

对此，上海天强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将尚未纳入预算体系的国有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后，除可进一步

5万元的高达68%，其中28%的高端用户每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超10万元。而欧洲旅游仍然是富裕人群出境游的首选，有54%的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去欧洲旅游，其次是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分别占22%、19%和18%。法国、英国、美国也是富裕人群比较喜欢的购物目的地。

同时，记者在《报告》中发现，70%的富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外，也有利于全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落实。

但在另一些人士看来，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需要根据国有企业发展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现阶段不宜过高。

国资专家称，既要考虑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也要考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处理好企业自身经营积累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需要的关系，避免计划经济时期“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等问题的再次出现。

此外，在央企“红利”的征缴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思考。一位国资专家对记者说，比如，扩大央企红利的来源，突破目前以净利润为主的单一结构，将产权转让收入和清算收入真正纳入其中，又比如在国有股权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研究产权关系复杂的企业如何征缴的问题等都需要研究。

尽管改革难度很大，但随着改革深入，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的比例提高一事已刻不容缓。

国务院日前批转的《意见》提出，要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

“上调的目标已经确定，关键看是一次性调整到位，还是分次调整？按照惯例来看，会一次性提高5个点，2011年的那次调整就是这样。”上述接近财政部的消息人士对记者说。

该《意见》还提出，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将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祝波善认为这更有意， “过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很大一部分在国资系统内封闭分配，在用做国企改革，或者给予损失企业支出，现在明确增量部分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无疑会使国有资本收益为社会公共分配做更多贡献，这也回归了国有资本收益的本意。”他说。(摘自《华夏时报》文/陈岩鹏)

二套房贷可能上调首付和利率 调控政策或加强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各地楼市加速回暖。面对不断走高的楼市预期，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未来房价上涨过快，现有的调控政策不仅不会放松，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收紧，调控还有很多牌。”

尽管楼市强势回暖，但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利剑却始终高悬头顶。中央财经大学民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认为，虽然楼市回暖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但如果房价持续上涨，限购、限贷政策不仅将进一步保持，还不排除更严厉的调控政策将会出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2012年货币供应充足，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是房价回暖的重要原因。如果房价上涨过快，不排除政府通过严格区分二套房投资、改善属性，将二套房调控差异化，进一步限制投资需求。

天津房产协会副会长徐保满认为，对于政府来讲，仍然手握房产税这张王牌，从长远来看，我国必将推出房产税，这将对于房地产投机行为产生极大的威慑力。

“应对房价上涨调控还有很多牌可打。”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持续上涨的房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调控措施可能进一步从紧，限购、限贷、限价皆从严，房贷也有进一步收紧的可能，三套继续停贷，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可能减少或取消，最大调整领域可能是二套房贷，很可能提高首付和利率；与此同时，税收加码，契税、营业税、个税、土地增值税，可能提高税负；增加土地供应，尤其是普通住宅用地，以及压制“地王”；将加强一线城市差异化，部分政策将增加一线城市的针对性。(摘自《扬子晚报》)

再看资本回报率，以中国制造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为例，从2007年最高水平17%左右降至2011年的10%，而美国制造业ROE稳定在13%至15%的水平。

从储蓄率看，中国投资率具有较强顺周期性，1991年、2000年投资率是低点，为36%和35%，1993年、2004年是高点，为45%和43%。2000年触底之后，2001年开始进入一个大的上升周期，2008年回调至41%后继续上升。与美国长期10%的储蓄率相比，中国的投资率(储蓄率)一直在30%以上，整体偏高。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尤其是2008年资产负债率加速提高，而同时资本回报率在下降，两者反向变动。

因此，中国M2与GDP之比偏高，与中国特有的增长模式有关，这种增长模式的特征是高储蓄率、高资产负债率、低劳动收入占比和不断下降的资本回报率。现在看来，在2007年、2008年左右是个拐点，当时为了应对经济减速，政府通过创造需求和扩张银行贷款刺激经济强化了这些特点，致使M2与GDP之比呈现加速上行的态势。

再来分析基础货币或外生货币。中国基础货币由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决定，而后两者又取决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盈余。基于外汇储备的人民币发行，除了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或央行将外汇再卖回给企业，基本没有回流机制。构建人民币发行自我约束机制最基本前提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但目前经常项目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资本项目甚至出现逆差。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间，我国外汇储备仅增长2.6%，这导致了基础货币增速下行。

结论很清楚，我国M2与GDP之比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是高储蓄率、高资产负债率、低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再加人民币依赖外汇占款的发行机制，居民收入的存款储蓄倾向和外汇占款流入补充企业现金流的综合反映。因而，这个比例过高，并不构成通胀或资产泡沫。

(摘自《上海证券报》文/陈光磊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分析师)